

中國

李喜所◎主编
刘集林 等◎著

晚清卷

留学通史

ZHONGGUO LIUXUE TONGSHI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國

晚清卷

留学通史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留学通史. 晚清卷 / 李喜所主编; 刘集林等撰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406 - 7973 - 6

I. ①中…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留学生教育 - 教育史 -
中国 - 清后期 IV. ①G648. 9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940 号

策划编辑: 吴曼华

责任编辑: 邹靖华

责任技编: 涂晓东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南蓊大车工业区东槿片)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47.5印张 950 000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06 - 7973 - 6

定价: 10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 -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 - 87621848

总导言

一、中国留学生的发展历程

留学是一种异国教育，即别国的学生留在某一国家学习。唐朝时期，日本来华的遣唐使常带一些青年学生来中国读书，为了系统而深入地研讨中国文化，这些遣唐使回国时总要留下不少青年继续学习，习惯上就称他们为“留学生”。久而久之，留学生就成了中国人出国学习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其中虽然也有“留洋生”、“游历生”、“洋学生”等各种称呼，但只有“留学生”一词被普遍认可。要溯源中国的留学生，出现得并不晚。早在汉唐时期，随着印度佛教的东来，常有一些高僧往印度研习佛学经典，开创了中国留学的先河。但毕竟人数少，影响也有限，没有形成气候。宋元明时期，极个别的中国青年通过特殊的渠道，也有涉足海外求学者，来华留学的外国人也偶尔有之，但相关记载甚少，描述他们的足迹相当困难。清代前期，一些青年往欧洲学习神学，和传教士关系密切，不过人数也少得可怜。比较正规意义上的留学，或者说把留学作为教育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留学教育只有一个半世纪多一点儿的历史。

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在美国传教士布朗（Rev. S. R. Brown）的帮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往美国留学。黄胜因身体原因，提前回国。黄宽后又往英国留学，成为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是中国西医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容闳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则产生了“留学教育救国”计划，即选派优秀的中国青年往美国留学，借西方之学术来改造中国，使古老落后的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然而，当容闳返回祖国实施其计划时，却遭遇到重重困难，经过18年的艰辛努力，才在1872年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决定4年派120名幼童，由容闳带领往美国留学。与此同时，清政府又于1877年从福州船政学堂等校选派严复等80多名青年往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学习海军、制造、矿业等科学技术。1896年，还选派13名学生往日本留学。在此期间，也有个别人自费或在传教士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资助下出国留学。总之，由于洋务运动对新人才的渴求，清政府才决定向国外派留学生。从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是中国留学教育兴起的产婆，容闳则起了催生的作用。

万事开头难。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明显带有起步时的许多不足，对于留学生的选派、留学年限、留学国别、所学专业、留学管理和使用等都没有明确的合理的政策，随意性很大。招收留美幼童时，几乎无人报名，容闳多从家乡通过亲朋好友来凑数，最后还从香港招了几名，才完成任务。幼童要在美国留学15年，还要学习中文课程。而赴欧洲的留学生则只学习一年或两年，三年以上的是少数，带有进修性质，基本没有读学位的。往日本留学则无明确的年限规定。至于所学专业 and 国内需求的问题，也不时相左。由于政治等许多复杂的问题，留美幼童1881年就中途全部撤回，回来后又不合理使用。人才浪费的历史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不过，从中国留学教育的长河去观察，这只是前进中的问题，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开风气之先，具有拓荒期的奠基功用。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三次规模宏大的留学潮，与之相呼应的则是辛亥革命、新中国诞生和改革开放。

第一次留学潮出现于20世纪初，以留日生为中心。这期间的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等虽然也有程度不同的拓展，但远不能和留日相提并论。1906年前后的十余年间，赴日留学者约有两万多人，上至七八十的老翁，下至十来岁的幼童，纷纷负笈东洋，留学求知。辽宁有位十几岁的男孩，在留日潮的感召下，偷偷背着干粮要赴日留学，结果流落在外七八天，被迫还乡。那时从天津、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总是挤满了赴日留学的青年。史书称当时的中国留日生势如“潮涌”，“相望于道”^①。之所以出现如此动人的“留日热”，是清末政治、经济、文化交织运作的结果。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被慈禧太后残酷地镇压了，但带来了一次实实在在的思想启蒙，人们了解和探求世界的热情越来越高。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接威胁着清廷的生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难当头，从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发，中国人对日本和欧美的研究极其迫切。时人甚至将留学和救亡联系在一起，多一个留学生就多一个爱国者。1901年后，清廷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将鼓励出国留学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促进青年学子出洋深造。1903年前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夺掉了旧式知识分子的饭碗，家庭环境比较好的，纷纷送子女出洋留学。这时期还涌现了大批新式学堂，为出国留学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后备军。加之赴日留学路近、省钱、语言困难相对较小；1905年孙中山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为一批热血青年所向往。在这种情况下，“留日热”的出现就势所必然了。但是，这股留日潮泥沙

^① [日]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7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俱下，混乱驳杂，出国无一定资格，也无考试，在日本学习随意性也很大，上小学、中学、职业学堂、专科、本科、速成科、军事学堂等不一而足，学业成绩优异者极少。1906年清政府举行首次归国留学生考试，名列前茅的都是欧美留学生。不过，这批留日生爱国热情高，政治空气浓，是孙中山发动反清革命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没有20世纪初的“留日热”，就很难有埋葬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而当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留日热”也随之慢慢降温了。

第二次留学潮和第一次留学潮仅相隔10年左右，就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这次留学潮以留美、留法、留苏为中心，当然留日、留英、留德等也有较大的发展。从总体上观察，这期间的北洋政府对出国留学基本上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这给了企图放洋的青年一定的自由度；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又迫使许多有头脑的学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出国留学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扬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给传统思想以巨大的冲击，更新观念、吸收世界新文化成了多数年轻留学生的追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和竞争理念大大增强，这也促使一部分青年去经风雨，观“洋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一批新的学堂和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的建立，新人才的需求日益紧迫；而一旦留学归来，就有较称心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这对青年学生出国有极大的吸引力；五四之后中国革命浪潮的重新掀起，召唤了许多青年为献身革命而出国留学，寻找真理。这些因素的交织回应，使留美、留法、留苏不断升温，为第二次留学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五四前后的留学潮持续时间长，平稳而较有序。1908年美国决定退回部分“庚款”以资助中国派留美学生后，1911年即设立了清华学堂，作为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于是以庚款留美生为中坚，加上众多的自费留美生和各个部门、企业、学校等派出的留美青年，使“中国留学生遍布于美国”^①。1925年在美国留学的世界各国学生约7500多人，中国则有2500多人，占三分之一。这些中国留学生素质高，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自治能力强，他们成立了各种社团，举办了许多颇有意义的活动，现存的《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月报》、《留美学生季报》及《科学》等杂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留美青年高昂的学习情趣和美好的追求。他们是用科学精神浇铸的一代让中华民族骄傲的有为青年。

如果说留美生的追逐目标主要是科学文化，那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则侧重于政治方面了。五四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兴起，一是在工读主义的推动下，许多青年试图寻求一种“劳工神圣”式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理想，而勤工俭学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好尝试；二是许多青年认为法兰西是自由民主的发祥地，梦想到法兰西去具体体验一下；三是当时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如蔡元培、

^① 参阅《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

李石曾等的全力推进。至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达到1600多人。他们一边做工，一边上学，辛苦异常。王若飞做工回来，在地铁车上就睡着了，过了站还不知道。这批人在学业上进展大的不多，多数念中学和职业学校。但他们切实地体验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对资本主义制度恨之甚深，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倍感亲切，并认真研究，落实于行动。留学期间，他们就组织革命活动，向国内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间，不仅涌现了许多有为的职业革命家，而且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社会主义能植根中国，这批人起了重要的作用。

“留苏热”的出现主要是政治革命的推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多效法苏俄，急切派革命青年往苏联学习；1924年国共两党成功合作，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又将派青年去苏联学习视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主要途径。为此，苏联当局在莫斯科专门创立了一所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大批接收中国留学生。1926年前后，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1600多名。他们基本是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旨在为中国革命培养英才。这批人后来确实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和领导人物，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影响深远。

三四十年代，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纷争以及苏联特殊的对华政策的实施，留苏学生主要由共产党来选派，但数量有限。国民党政府则集中往美国派留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赴美留学，人数达5000左右。这期间，赴英国的留学生也有所增加，有近千人。不过就整体上来观察，还很难说又出现了一次牵动着中国社会的留学潮，只能讲是第二次留学潮和第三次留学潮之间的一股巨浪。

第三次留学潮的兴起较为曲折，但规模大，时间长，影响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曾给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但那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特别是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出国留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关注的大问题，所派出的留学生也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心。从1950年到1966年，派往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的留学生约13000多人。总数看起来不少，但就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讲，就很不相称了。而且80%是留苏生。1966—1976年10年间，举国上下陷于“文化大革命”，想出国留学无疑会遭到大批判。所以，这期间除了语言、外交等领域外，基本上关闭了出国留学的大门。学语言和外交的留学生也只有千余名。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调动了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热情，在邓小平亲自关怀和指导下，伴随着1978年12月26日50名留美学者的启程，留学人数逐年递增。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国留学涉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到20多万人。至2000年，官方的统计数字是50万人左右，2004年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是70万人。这真是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其中，除公派之外，自费留学占很大比重。每年考“TOFEL（托福）”、“GRE”的青年学子都会排成长长的大队，出国留学牵动着千

家万户，渐渐由单纯的教育问题扩展为一个社会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热烈的留学潮，一是改革开放的推动，留学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三是被“文革”禁锢了十几年后，国人渴求了解世界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四是许多家长希望子女接受更良好的教育；五是国外许多大学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增加收入。多种因素的结合，促成了留学大潮的到来。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积极而宽松的留学政策。除了对自费出国的大力支持之外，1992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从而给留学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尽管这股留学潮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留学生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支特殊力量已经日益显现出来。

二、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

留学教育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逐步深化而逐步发展并走向高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留学生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反过来，留学生又是推进中国革命和改良的一支重要力量，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革，留学生都是“弄潮儿”。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良性互动，突显出留学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了留学生的社会地位。

19世纪70年代派往美国和欧洲的留学生本身就是洋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封建教育的挑战，这等于告诉国人在旧式教育之外还有一种新式的更具吸引力的西方教育，除了孔孟儒家经典还有可以强国富民的新的学问。这批留学生回国后不仅在海军、铁路、通讯、矿业、金融、工厂企业、外交、新式学堂等方面促进了洋务事业的发展，而且带来了西方的现代理念和新的价值追求，严复、马建忠等人的著作则对思想启蒙意义深远。后来严复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成为维新时期仅次于康有为、梁启超的重要领袖人物。当然，那时的留学生由于人数少，又多出没于十分具体的工商业部门，在洋务和戊戌维新时期没有显现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效应。他们只是崭露头角而已。

较之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清末民初的留学生对社会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要大得多。甚至可以讲，留学生作为一个新型的特殊的知识群体作用于中国社会是从这期间开始的。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和“中华民国”的创建，留学生功不可没。孙中山曾多次讲他发动辛亥革命、组织同盟会，靠的就是当时留学日本的两万多中国学生。那时指导革命的精英分子，多是留洋出身。革命政党、民间社团的组建，创办杂志和各式各样的舆论宣传，制订革命方略以及策动武装起义，多以留学生为中坚。武昌起义后，宪法的出台、具体法律文件的起草、国家机构的设置、各部的的主要人选、政党政治的运作等，基本出自留学生之手。与此同时，法律、军事、财政、教育以及学术文化等许多领域的改革，都和留学

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清末法律的全面改革和民国初年共和政治理念的传播，留学生做了大量工作，那时留学生主办的政治、法学杂志就有十多种。当时军事的现代化，例如新军的组建、训练及新型装备，多由留学生来办理，大量的军官也由留学生出任，军事理论的更新更离不开归国的留学生。民国组建的民军，其上层骨干分子多留过洋。清末民初的现代军事家，如黄兴、蔡锷、蒋方震等，皆是留日生。在20世纪初期中国教育发生根本变革的大潮中，留学生也举足轻重。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教育理论和管理模式，多由留学生输入。中等学校以上的教师队伍中，留学生占相当比例。至于大学师资，十之八九有留学经历。学校的教材建设，或翻译、或编写，留学生自是主导。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展和政治变革力量的推动，清末民初的学术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19世纪末那种要不要引进西学的激烈争论不见了，“中体西用”和“新学旧学”的分辩也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在广泛输入西学基础上的全面的学术更新。用梁启超的话讲叫中西文化“结婚”^①；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②通过中西文化的融合，“史学革命”、“文学改良”、“教育普及”、“科学万能”、“工读主义”等文化思想流派风行一时，而现代史学、文学、语言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和现代数理化、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工程学等也通过大学新的学科的创立，逐渐涌现出来。而这些学科的奠基人物，基本都是留学归来的青年。较之政治领域的变革，这种学术文化方面的更新虽然不够轰轰烈烈，但其社会影响则更深入和久远。五四之后学术界之所以会爆发更深刻的革新，是因为清末民初已经开启了其活水源头。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动荡的影响，191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发生了新的变化。鸦片战争后80年间那种单纯向欧美学习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元追求被打破了，增添了仿效苏俄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行动。同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崛起，和国民党并驾齐驱，决定中国政治的起伏消长，在思想文化领域又渐渐出现了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新儒家三足鼎立的局面。社会变革的风潮相互交织，复杂多变，为数千年中国历史所少见。在这种政治生态制约下的归国留学生的走向较之清末民初就起伏不定，令人眼花缭乱了。总之，五四之后政治和思想的多元格局，决定了留学生的多重色彩。

就政治状况而言，留学生游弋于国共两党中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那时的政治变革，进一步显现出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密切关系。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多有留学经历，陈独秀、李大钊曾留学日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是留欧生，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卷23，第67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② 转见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第7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刘少奇、瞿秋白等留学苏联，毛泽东虽然没有负笈海外，但对留法勤工俭学非常支持，与留学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共产党创立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留学生的作用非同小可。其中，留苏生最为突出，留日生和留欧生次之，留美生相对弱一点。在组织上，留学生为共产党的干部尤其高级干部的准备，初创时期最为明显。20年代的中共领导人中，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比例甚高；30年代前后，很多高级干部是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而在思想文化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以及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等新兴学说在中国的确立，留学生出力最多。至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和与之相联系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破土而出，留学生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从主流上讲，留学生沟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国民党政府里的留学生比中共要多得多，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不过从总的趋向来看，留学生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都对国民政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国民政府的历届高官中，留学生出身者比例很高，且不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头面人物都留过洋。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活动，归国留学生业绩出众者也可以举出很多。创办天津永利化工企业的范旭东和侯德榜，创建天津东亚毛纺厂的宋斐卿等就是留学生的突出代表。由于蒋介石留日时学习军事，故留日生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设影响很大。30年代的大学校长，留美生占到80%以上。还应指出的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十分活跃的民主党派，多由归国留学生组建。他们在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等方面，成果不凡。“五四”之后30年间的社会进步虽然极其复杂，但可以清晰地发现留学生在其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多种因素的交互冲击下，1919年后的中国学术文化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新的现代学科群的发展和壮大，以及现代学术理念研究范式的确立，使传统学术文化渐渐步入了现代。而推进这一划时代学术变革的核心力量，就是从欧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留德归来的蔡元培，利用其担任北大校长的优势，大力倡导和培植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现代学术环境；留美归来的胡适，竭力传播他老师杜威的思想学说和思维方式，试图将美国的学术规范和方法移植过来，从而对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加以根本的改造，遂成为学界的领袖人物；留日归来的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主要开拓者；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侯德榜、茅以升、李四光、竺可桢等，则经过艰苦而长期的努力，将清末民初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自然科学学科进一步巩固和壮大。20年代在清华国学院执教的4位名教授，陈寅恪、赵元任是留学精英，王国维和梁启超虽然没有正规的留学经历，但王国维在日本京都大学作过数年的教学和研究，梁启超流亡海外14年，于欧美、日本的学术文化有精深的研究，他们也堪称留学生式的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恰是在这些通中西、博古今的现代著名学者的导引下，中国学术才逐步走向现代。具体来讲，一是现代自然学科基本成熟，在学界地位突出。随着一批著名大学的建立

和发展，数理化、天文、地理、农业、医学、工程等学科已经形成气候，并逐步涌现出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专家、教授，还创办了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杂志和颇具影响力的学会。二是在传统的文史研究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五四之前萌芽的那些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新学科，在学术队伍、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飞跃。三是在30年代整个学界出现了重视“实学”和“科学”的新风尚，形成了热心研究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各种学术问题的新趋向，同时注重在学术研究中贯彻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管理，慢慢使科学精神变为学术发展的灵魂。竺可桢曾明确讲过：“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产生近代科学。换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器，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然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①这样的学术理念，不仅对学术的现代化至关重要，而且有利于全社会的进步。留学生善于融合中西文化的独特优势，决定了他们在深层的学术文化变革当中也语出惊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留学生走向虽然是在政治的左右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影响最突出的倒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科技、教育等学术文化领域。从1949年到1956年，海外学子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和美好憧憬，克服难以想象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种种困难，返回祖国。这期间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回国的留学生约3000多人，占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半数之上。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钱学森、钱三强、严东生、邓稼先、郭永怀、谢希德、张文裕、林兰英、吴文俊、吴冠中、唐敖庆、赵忠尧等一批学界的泰斗。他们归国后，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科技与教育等奠定了基础，最基本的实验室的组建、研究资料的收集、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的确立、基本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学计划的审定等，他们发挥的基本是核心和指导作用。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如“两弹一星”等，他们大都是领军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个别人则由于劳累过度，英年早逝。这种为国献身的奋斗精神，永远为国人所铭记。历史地看，新中国现代科技、教育事业的起步，这批归国留学生是开路先锋。留苏生因其特有的政治优势，在五六十年的中国十分活跃。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尤其是科技、教育、外交等领域，留苏生挑大梁的不在少数。中央领导层里的江泽民、李鹏、钱其琛等，则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数留苏生活跃在大专院校、科技领域，为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0年代前后许多学科的重要学科带头人中，留苏生占相当的比例。留苏生在新中国科技、教育等社会文化变革中承先启后，不可或缺。

1978年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留学生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更具多元的开放色彩。他们不仅仅限于单一的归国服务的传统模式，不少人与国内的科研机构搞合作研

^①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第229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究，或利用国外的信息和资源优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献计效力。还有的往来于国内和国外，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往国外做几年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科学文化与世界同步和融合。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也基本打破了以往一切由政府包办来安排工作的习惯做法，多由留学生自己选择职业，政府主要起提供信息和方便的引导作用。留学生的社会分布面较以往广泛得多。热爱行政工作的，多往党和国家的各级部门任职，各级机构的公务员中有不少留学生；喜欢从事学术研究者，则受聘于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往往成为那里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热心于办企业、建公司者，就选定最有发展前途的地点和领域，奋斗拼搏，顺利者成长为著名企业家；总之，各行各业几乎都有留学生参与其中。留学生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紧密，留学生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突出。《神州学人》2004年第4期的一则报道称：“从1978年至今，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有70.02万人，有17.26万人学成回国。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4%，中国医学科学院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37.3%，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的13.7%，‘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负责人组长以上科学家的72%，入选‘千百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的18%，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员的93%，都有留学经历。目前，全国已建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110家，入园企业达6000家，入园创业留学人员约15000人，2003年科工贸总收入约327亿元。”总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留学生不仅成为中国人才资源的主要宝库之一，而且在科技创业上有大的拓展，同时留学生也会随着中国的融入世界，其“神秘”的面纱和特殊的被社会“娇惯”的地位将慢慢退去。

三、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轨迹

1. 清末民国的缓缓起步

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在20世纪初已初露端倪，此后的百年间虽然起伏不定，但总是螺旋式地向纵深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留学史的研究恰是由留学奠基人容闳首先开始的。1909年容闳在纽约出版了他用英文写的自传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翻译成中文《西学东渐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容闳在书中用几乎一半的篇幅叙述他的留学经历和选派留美幼童出国的曲折历程，同时对留美幼童的培养、围绕幼童展开的斗争及幼童的结局等，都作了十分详尽而中肯的评说，是研究中国留学史特别是留美幼童史的必读书。与此同时，随着留学生自办刊物的增多，留美生、留日生在他们的刊物上也发表一些关于中国留学生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刊登一点留学生的名录和人数统计等，还发表对中国留学教育成败得失的比较尖锐的时评，比如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1914年第1期上发表的《非留学生篇》等。那时比较有影响的学部的官报、教育部的公报以及《教育

杂志》、《中华教育界》等，也有不少内容丰富的描述中国留学生现状和论述其发展轨迹的文章。这些回忆和评述虽然与比较规范的史学研究有一定距离，只可看作当代人对当代留学生的一种记述或时评，但今天看来则是非常难得的珍贵史料，不可不参阅和借鉴。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留学史的专著是192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该书按时间顺序，从容闳促成洋务运动时期留美幼童的派遣谈起，叙述了留欧、留日、留美等国的留学状况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并就留学政策、留学生的成就和问题进行了较客观的评析，书中的各种统计表为后来的留学生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的多数留学史著作多仿照该书的体例编撰，只是具体的枝节部分有所变动。1928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4册），其中关于留学教育也占一定比重，这为开展留学史研究提供了起码的素材。在舒新城的推动下，留学史的研究也逐步被人关注，陆续发表的各种论文、回忆录、时评、访谈、大事记、名录、统计数字等，颇有参考价值。整个民国时期，相关的文论大致在300篇左右，虽然不算多，但毕竟打开了留学史研究的通道。尤其是留学生团体，如环球中国留学生会等所进行的一些留学生调查，还有教育部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一些比较权威的教育年鉴等，在留学生统计方面成果不凡，至今仍为学界所征引。如果说清末是留学史研究的序曲，那么，民国时期则步入了比较正规意义上的起步阶段了。

2. 新中国成立后和80年代的曲折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左倾”思潮的长期困扰下，几乎和留学教育逐步走向低谷同步，留学史的研究也趋于低落，直至“文革”时处于停顿状态。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涉及留学教育的论文不到一百篇，论述范围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是选择和“反帝”相关的一些留学事件，诸如“庚款留学教育”，深入批判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罪行；二是对与革命运动联系密切的留学运动，如清末的留日、五四的留法勤工俭学、留苏等，加以弘扬；三是对一些有留学经历的重要人物，像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鲁迅等，表彰他们留学期间的爱国和革命精神，也有数篇专门探讨容闳的论文，不过是讨论其阶级定位和政治属性。从总的倾向上看，这期间的留学史研究基本从属于政治需要，学术拓展有限。进入80年代之后，留学大潮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留学史的研究兴趣，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包容、开放的良好学术环境为广大学者提供了大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几部综合论述中国留学生发展历史的专著陆续问世，如颖之的《中国近代留学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董守义的《清代留学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黄新宪的《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征是比较实事求是地论述了中国留学生走过的曲折历程，对一些重要留学事件、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留学政策的转化等分析得较为透彻，尤其对留学生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影响作了非常客观公允的评价，相对极“左”年

代的史学论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受整体研究水平的制约，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著作在新资料的挖掘以及对留学生的多侧面、新领域的开拓上还不尽如人意。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和整体论述留学史相匹配的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的拓展。由张允侯、殷叙彝编辑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8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基本研究资料，内容十分丰富。1988年又出版了第二册。清华大学编写组编写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也于198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不少珍贵的档案和文献史料。贺培珍的《留法勤工俭学日记》也于198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张洪祥、王永祥合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这些论著和专题史料，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但在总的思想指导和研究理念上仍将重心放在革命运动史上，缺乏从留学教育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与留学史论著不断问世的喜人态势相辉映，研究论文也与日俱增。粗略统计，80年代的留学生论文约有200篇左右。内容主要涉及：

(1) 对留学生历史和贡献的总体评述。较有影响的论文有苏贵民的《中国近代留学生》（《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潘君祥的《从爱国主义到探索马克思主义——我国近代留学生爱国思想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李喜所的《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人民日报》1987年6月8日）。这类文章着眼于宏观考察，旨在从总体上去把握中国留学生的走向及其客观历史定位，但数量不多，不到十篇。

(2) 留美生。这时期的留美研究已经突破了极“左”年代一味批判美国“文化侵略”的束缚，较客观地去论述留美生的生活、学习及其对祖国的贡献等。如李喜所的《清末民初的留美学生》（《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黄新宪的《退还庚子赔款与清末留美生的派遣》（《教育科学》1987年第4期）、李守郡的《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的选派》（《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黄知正的《五四时期留美生对科学的传播》（《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此外，还有数篇文章专门论述早期留美幼童的派遣及其历史意义。

(3) 留日生。有关的论文有二十多篇，研究的重点是留日生与辛亥革命；留日生与拒俄运动；留日生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留日生与中日关系；留日生与中日文化交流；留日生与中国社会变革；以及留日生的数量、留学观、中日留学教育比较等。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喜所的《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运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丁焕章的《试论留日学生运动》（《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冯玉荣的《留日学生运动与辛亥革命》（《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田正平的《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文史》1988年总30期）、黄新宪的《留日学生与近代社会的变革》（《福建论坛》1989年第2期）等。

(4) 留欧生。这方面的研究重点仍停留在留法勤工俭学上，相关的论文有近十篇。王永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概况》（《历史教学》1984年第6期）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这场留学运动的发展情况；赵原璧的《赴法勤工俭学缘起辨析》（《河北学刊》1985年第5期）深入分析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背景，并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祁建民的《试论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和旅欧党团组织的历史作用和特点》（《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着重考察了党团组织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关系；曾昭顺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则将留法勤工俭学放在中国革命的总体进程中来考察，充分肯定这场留学运动的革命意义。总之，这些论文基本和前面叙述的留法勤工俭学图书相一致，大都从革命史的角度解读这场求学运动。除留法勤工俭学的研究之外，米镇波的《赴苏俄留学述略（1925—1930）》（《党史纵横》1988年第4期）对20年代的“留俄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述。黄新宪的《莫斯科“中大”、“东大”与国共两党留苏生》（《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3期）选择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为研究重点，深入论述了留苏生的学习状况和思想追求。李喜所的《中国近代第一批留欧学生》（《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对洋务运动时期派往欧洲的严复等八十多名留学生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评说，列有不少统计表格。徐彻的《中国第一届赴欧海军留学生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5期）将在英国和法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的状况及其在中国海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了较客观的论述。但是，从总体上看，对留英、留德，包括对留法、留俄生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5) 人物。整个80年代，涉及留学生及与留学教育有关的主要人物有：容闳，相关论文6篇，重点研究其生平和留学教育思想、活动等；张之洞，3篇，论及其留学教育主张及对派遣留学生的贡献；胡适，1篇，评述其政治思想；孙中山，1篇，涉及其与留日生的关系；秋瑾，1篇，考证其留日时间和住址；邹容，2篇，考证其留日时间及与日本的关系；李大钊，2篇，考证他留日时期的一些史实；陈独秀，1篇，论述其第一次赴日时的留学情况；鲁迅，1篇，分析其留日时期的思想变迁及其哲学基础；周恩来，4篇，集中论述其留学期间的思想特征及对革命的贡献。总之，对留学生代表人物的研究有一些成果，但非常薄弱。突出表现在：研究的人物数量少，和众多的留学精英不成比例；研究的内容和角度都比较传统和呆板，较少新的突破。

(6) 其他。对于一些省份的地方留学生，也有文章专门论述。如关于四川留学生的论文在80年代就发表了4篇。郑城的《四川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9期）、王笛的《清末四川留日学生述概》（《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都对四川的留日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侯德础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则在论述四川学者在法国勤工俭学有新的开拓。此外，对云南、天津、兰州、湖南等地的留学生也有个别

文章论及。还有少数论文专门讨论留学生创办的刊物，如黄国华的《清末第一个以省区命名的刊物——〈湖北学生界〉》（《历史教学》1980年第4期）和王公望的《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刊物——〈夏声〉》（《兰州学刊》1984年第3期）。另外对女子留学生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周一川的《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论述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论文也有几篇，例如吴廷嘉的《近代留学教育与中西学术交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周德昌的《近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教育交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对留学生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媒体作用和特点有较多的探索。

3. 90年代以来的逐步深化

较之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的拓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陆续出版的专著就达15部。通论留学生的有李喜所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作者多年研究留学生的一部新作，主要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角度探讨留学生的特殊作用，在史料和观点上都有一定的突破。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先比较准确地叙述1840年到1949年中国留学生发展的曲折历程和各个阶段的特点，然后分若干专题，如留学生与中国政治、教育、科技等，进行有理有据的专题考察，颇有学术深度。田正平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选择教育为突破口，深入探讨了留学生在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谓专题研究中国留学生的代表作。沈殿成的《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详细叙述了1896年到1996年中国留日学生的发展过程，并就一些重大留学事件作了深入的考察，也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周棉的《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将着眼点放在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上，较全面地评述了中国留学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特殊贡献。周棉主编的《中国留学生大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收录4000多名较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可谓蔚为大观，并在附录中收集了留学生的一些统计表格，使用十分方便。人事部主编的《新中国留学归国人员大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重点记录了1949年后40年间归国留学生的生平和业绩。此外，李喜所的《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鲜于浩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年版）、王奇生的《留学与救国：抗战期间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靳明全的《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都从不同侧面对留学生的研究有较大的推进，个别著作虽然学术水平有待提高，但在总体倾向上对留学生的研究还是有贡献的。概括地讲，90年代的著作较80年代以前有较大的推进，突出表现在：（1）几部

留学生通史著作在研究范围、研究角度和使用资料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标志着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2) 对不同阶段的留学史如留法勤工俭学、抗日战争时期，对不同领域的留学生如教育、女子留学等，对不同国别的留学生如留日生等，对留学生代表人物如容闳，都有专著加以研究，反映了留学生研究的逐步深化。

在留学史料的编辑上，90年代也有显著进展。陈学恂、田正平等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汇集了研究中国留学史的最基本的史料，是步入此研究领域的必读书。遗憾的是所收资料有限，很难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的文化教育编涉及留学教育的颇多，从中可以了解留学生的选派、留学政策的演变、留学管理的变迁、留学人数以及围绕留学生的一些对外交涉等，资料极其珍贵。令人难以如愿的是，史料的量还不够大，选择面应该再宽一些，内容再丰富一些。不过，这些已公布的档案资料为人们进一步查阅提供了必要的线索，难能可贵。学术大师季羨林的留学回忆录《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不仅叙述了自己在德国的留学生涯，而且提供了许多留学生的生活细节和珍贵史料，很有参考价值。综合来看，虽然留学史料的编辑在90年代有一定进展，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未能尽如人意，和百年以来蔚为大观的留学现象相比尚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90年代探讨留学生的论文达到了500余篇，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有较大的进展。从宏观上综合评论留学生的就有10多篇，如马林安的《浅论中国近现代留学生史的分期、特点和代表人物》（《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李华兴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史林》1996年第3期）、周棉的《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及今后趋势之展望》（《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张海鹏的《中国留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佟玉兰的《中国近代的留学及其特征》（《北京科技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分别就留学生的发展轨迹以及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进行了分析，便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留学生的脉搏。涉及留学政策的论文有8篇，但有7篇集中论述清末的留学政策，触及留学生的选派、管理、使用、考试等许多方面，颇有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如冯开文的《论晚清的留学政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杨学萍的《试论清末的留学制度》（《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邓绍辉的《清政府对回国留学生的政策》（《文史杂志》1995年第1期）等，在考察晚清留学政策的成败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拓。另一篇论文是孔凡岭的《1927—1937年南京政府出国留学政策》（《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详细探讨了国民政府留学生的派遣政策，并结合历史实际给予恰当的评判。涉及留美生的论文有18篇，集中论述“庚款”留美的就达6篇，论述早期留美幼童的亦有5篇，此外